

乡村旅游地发展影响因素组态与路径研究 ——基于 17 个乡村案例地的定性比较分析

余润哲¹ 张圆刚^{2, 3} 余向洋⁴¹

(1. 南京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中国江苏 南京 210046;

2. 上海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 中国 上海 200234;

3.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 中国 北京 100101;

4. 黄山学院旅游学院, 中国安徽 黄山 245021)

【摘要】: 乡村旅游地发展影响因素是学界和业界关注的重点。文章采用多变量交互作用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以乡村旅游吸引物、旅游区位、外资注入、区域经济和网络平台为前因变量, 探索其中符合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理论逻辑的前因条件组合, 并建立与被解释变量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 (1) 单因素分析中, 旅游区位和网络平台可视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必要条件, 但所有单变量因素均不能构成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的充分必要条件。(2) 5 个变量共产生 32 种条件组合, 满足条件的组合路径共 4 条。(3) 前因条件构型的一致性指标均大于理论阈值 0.8, 4 组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的充分条件组合, 总体覆盖率为 0.909091, 能够很好地解释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组合。(4) 在路径组合中, 网络平台和旅游区位是在不同要素组合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单要素, 其二者共同出现并且与区域经济组合的路径显示出最高的原始覆盖率。

【关键词】: 乡村旅游地发展 组态因素 影响路径 定性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 F590.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462 (2021) 09-0225-07

乡村旅游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观理论、推进旅游精准扶贫、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以及实现乡村城镇化的重要途径。2018 年, 我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量达到 30 亿人次, 收入超过 8000 亿人民币。在实践中, 乡村旅游不仅可以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农民收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还可以推动弘扬乡村文化。不过, 在乡村旅游高速发展的同时, 客观上也存在着不同区域甚至同一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均衡的状态, 因此, 乡村旅游发展的驱动因素也成为旅游研究中的重点^[1, 2]。

作者简介: 余润哲 (1994-), 男, 安徽滁州人,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旅游者环境行为等。E-mail: 292806373@qq.com; 张圆刚 (1982-), 男, 安徽黄山人,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乡村旅游、旅游目的地环境等。E-mail: zhangyg621@126.com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 (KF2020-0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571140); 上海市艺术科学规划项目 (YB2020G08)

既往研究从旅游吸引物、旅游区位、旅游地管理、区域经济以及外资注入等方面分析了乡村旅游发展的驱动因素^[2,3,4]；也分析了政府政策对乡村旅游发展日益显著的作用^[5]。新时代的研究也指出网络平台作为推进乡村旅游发展的新支撑作用^[6]。以往研究多基于定性或者定量方法，尚未对概念模型进行定性比较分析法的检验。当下乡村旅游发展的因素复杂多样，同一发展结果的产生可能是多重条件组合而导致的，因此需要从组合的角度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基于此，本研究以长三角地区 17 个乡村旅游地为例，使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建立影响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超越了以往单一定性与定量研究的界限，能够揭示出原因背后的复杂性，厘清多个自变量的复杂关系对因变量的影响^[7]。

1 理论综述与变量选择

1.1 乡村旅游地发展研究

乡村旅游是在乡村地域范围内开展的旅游活动，是相对城市旅游等提出的概念^[8]，其具体定义在国内外研究中不一而足，从旅游活动的发生场所来看，欧洲联盟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乡村旅游定义为发生在乡村的旅游活动；从依托的资源角度来看，乡村旅游是指在乡村地区，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和人文客体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9,10]。在乡村旅游地发展研究中，视角主要包括区域资源特色、开发经营管理、产品和综合视角等^[11]。学者指出乡村旅游地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受到资源、市场以及政策等多个方面的影响^[12]。因此乡村旅游地发展理论也包含共生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可持续发展观等多种视角^[13]。在具体的影响因素方面，王莹等指出政府政策、经营管理、区位环境、资源特色等因子^[14]；卢小丽等通过 DEMATEL 方法对乡村旅游发展关键影响因素进行了多次迭代后发现经营管理、政策、区位影响力较大^[15]；安传艳等通过对国外乡村旅游地发展研究进行综述，指出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政策导向性明显，政权干预涉及到了制度设计、资金投入、基层管理机构组建等多个方面，需重构本土理论^[16]。虽然不同研究指出了多样的发展理论或影响因子，但目前对驱动因素和动力的作用关系、路径和强度分析仍存在模糊不清的问题，从而导致动力机制不明晰^[2]。因此，本研究对以往乡村旅游地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梳理，探究其组态与路径，通过对以往影响要素进行归纳和提炼，结合当下乡村旅游地发展实践，从旅游吸引物、旅游区位、旅游地管理、政府政策、外资注入、区域经济、网络平台 7 个变量角度进行定性比较分析。

1.2 变量选择

1.2.1 旅游吸引物

乡村发展休闲旅游的基础是丰富的农业农村资源^[17]，资源转化为旅游吸引物，形成能够吸引旅游者旅游景点，包含核心属性和附加属性，两者分别是指独特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和功能方面属性^[2,18]。旅游吸引物一直被认为是影响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是游客选择旅游地最根本的原因，其对乡村旅游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得到了陈志军等人研究证明^[2]。

1.2.2 旅游区位

旅游区位是旅游地与客源地及各旅游地之间的位置关系、连接程度和等级层次，包括资源区位、市场区位、交通区位、认知区位等^[19]。在乡村旅游发展中，旅游地的空间竞争、交通区位、客源市场等等都会影响当地的旅游竞争力。马斌斌等指出，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分布要集中在经济发达、自然资源富集的东部地区，多以省会城市、主干路网为核心^[20]。相反，一些中部地区旅游区位较差，交通通达度较低，进而造成乡村旅游发展落后^[3]。王松茂等人也证明了旅游区位对乡村旅游发展具有的影响^[21]。

1.2.3 旅游地管理

旅游地管理是指在特定的旅游区域内，协调处理该地域的经济、社会和地理要素的各种事务^[22]。有效的管理可以整合以及增强旅游地的核心资源，扩大吸引物的影响力。保证各类资源的质量和有效性，是旅游地获取成功的条件^[23]。常用的旅游地管理方

式包括旅游地营销活动、信息化管理、机构推进、基础设施资源维护等等^[2]。研究者通过定性和定量方法证明了旅游地管理对乡村旅游发展具有正向影响^[14, 24]。

1.2.4 政府政策

政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政府的重视程度、引导和支持力度、宏观管理的具体行为^[25]，是繁荣乡村旅游的基本前提^[26]，研究者也经常从治理角度对其进行讨论^[27]。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更需要政策创新与制度供给的强有力推动^[28]，尤其是因地制宜、上下配套的政府政策^[29]。

1.2.5 外资注入

外资注入是指外部资本大量介入旅游开发^[4]，源于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等手段吸引外来企业进行投资^[30]。外资注入的主要驱动力量是社会资本，开发模式以企业主导为主，同时也会促进乡村旅游地市场化发展。本研究中外资资本大量介入的衡量标准是旅游景区是否由外地企业主导进行管理。

1.2.6 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城市居民的旅游消费^[26]。近年来，我国经济稳步发展，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旅游消费进一步增加，乡村旅游也得到快速发展。乡村旅游地的重要客源来自周边城市，因此不同区域的经济水平所带来的乡村旅游发展驱动力程度也不同。研究表明，区域经济发达的地区旅游发展指数往往要高于区域经济一般地区^[31]。

1.2.7 网络平台

网络平台改变了乡村旅游传统的营销模式、消费模式、经营方式，拓展了乡村旅游的产业链条^[6]，对乡村旅游发展的促进作用日益增大^[32]。网络平台可以树立乡村旅游的良好形象，提升乡村旅游的竞争力^[6]。疫情背景下，网络平台更是成为旅游地发展的重要新依托。

2 研究设计与案例选择

2.1 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研究方法最早由拉金在其专著《比较法：超越定性和定量的策略》中提出，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该方法得到了普遍认可，并在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QCA 兼具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的特征。与传统量化研究方法中追求数据拟合效果较好的单一因果关系的模型相比，QCA 追求识别多重并发因果关系，即不同变量条件组合能够表达出相同的效应。QCA 方法强调从中、小型样本数据中挖掘出研究问题可能的因果性关系，通过实证数据与案例的不断对话，根据布尔代数（Boolean algebra）的原则对条件组合进行简化^[33, 34]。

根据研究内容不同，QCA 可分为清晰集（csQCA）、多值集（mvQCA）和模糊集（fsQCA）。本文选择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原因如下：第一，本研究探索可能的影响因素对乡村旅游发展是否起到推动作用，符合 csQCA 方法主要用来处理二分变量的特征^[35]；第二，csQCA 方法的核心认为条件变量并不是独立的影响因素，而是以组合路径的方式影响结果，用 csQCA 方法能挖掘出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的多条路径^[36]；第三，使用 csQCA 方法可以对不同案例区之间进行比较，探寻其中符合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理论逻辑的前因条件组合，并建立与被解释变量的因果关系。

2.2 研究案例地与变量选择

为使研究案例地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本研究的选择范围覆盖安徽、浙江、江苏、上海等地等 17 个旅游业发展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乡村旅游地,具体包括安徽省的西递、宏村、潜口、龙川、唐模;浙江省的下姜村、乌镇、西塘、溪口、南浔;江苏省的周庄、同里、甪直、蒋巷村、不老村;上海市的金山嘴渔村、崇明区前卫村。通过查找数据年鉴、官网公开信息、电话查询以及政府信箱获取准确的数据来源。基于以往文献的文献整理,选取七个条件变量分别为旅游吸引物、旅游区位、旅游地管理、政府政策、外资注入、区域经济、网络平台。不过,通过初步筛选可发现,就政府政策要素来说,各地政府均出台相关文件政策支持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就旅游地管理要素来说,其判断标准是指有无旅游规划、信息化管理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因素,对所有符合乡村旅游地概念的案例地来说,其旅游地管理均符合标准。因此,政府政策和旅游地管理这两个变量属于赋值无差别的条件变量,因此不纳入条件组合分析。最终,研究确定纳入分析的 5 个条件变量分别为旅游吸引物、旅游区位、外资注入、区域经济,和网络平台。

2.3 变量赋值

csQCA 假定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同一结果的发生可能存在不同的组合。csQCA 一般将变量赋值分别为 0 和 1,运用布尔代数计算原则简化条件组合。根据旅游吸引物研究,利用 5A 级景区来衡量旅游景区的内在品质,案例中的旅游地是 5A 级景区赋值为 1;反之,为 0^[2]。市区距离旅游地的交通通达性是影响旅游区位的重要因素,案例中的景区与市区距离在一小时车程之内赋值为 1;反之,为 0^[2]。外地企业介入主导旅游开发的阶段定义为旅游外资注入的标准,案例中景区由当地政府、集体主导进行管理赋值为 0;反之,为 1^[4]。区域经济中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乡村旅游发展有很强联系,案例中景区所属地级市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赋值为 1;反之,为 0^[25]。网络平台的完善对中国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有了新的影响和改变,案例中景区利用完善内容的网站进行宣传赋值为 1;反之,为 0^[6]。被解释变量采用年接待游客量作为旅游地发展的指标。赋值方式和构建的真值表分别见表 2 和表 3。

3 结果分析

3.1 单变量必要性分析

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首先要判断单一条件变量是否为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的必要条件。其中对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构成必要性的条件变量为被解释变量集合的子集^[35,36],当单个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大于 0.9 时,即可视为被解释变量的必要条件^[37],公式为:

$$Consistency(X_i \leq Y_i) = \frac{\sum \min(X_i, Y_i)}{\sum X_i} \quad (1)$$

式中: X_i 为条件组合中的隶属分数; Y_i 为结果中的隶属分数; Consistency 取值范围为 (0,1)。

对乡村旅游发展单变量影响因素能否构成被解释变量的充要条件进行检测,结果见表 4。可以看出,旅游区位和网络平台的一致性均达到 0.9 以上。单因素分析中,只有一致性指标大于 0.9,可视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必要条件^[38]。因此,旅游区位和网络平台可视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必要条件。旅游吸引物和区域经济的一致性在 0.7~0.8 之间;外资注入的一致性较低,只有 0.27。但是,所有的单变量因素均不能构成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的充分必要条件,即当影响因素单独出现时,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并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结果,因此要进行多因素组合分析。

3.2 多因素组合分析

因素组合分析可通过覆盖率指标 (coverage) 来判断条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力度^[36]。在本研究中覆盖率表示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的条件变量对因果路径的解释能力, 即覆盖率数值越高, 对于因果路径的解释能力越好, 覆盖率公式为:

$$Coverage(X_i \leq Y_i) = \frac{\sum \min(X_i, Y_i)}{\sum Y_i} \quad (2)$$

式中: X_i 、 Y_i 的含义同公式 (1), Coverage 取值范围为 (0, 1)。

对 17 份个案数据分析输出复杂解、中间解和简化解。在实际分析中, 通常将简化解和中间解共有的条件组合称为核心条件, 研究者倾向于使用输出的中间解分析充分条件的组合^[39]。本研究亦采用中间解输出结果进行分析, 5 个变量共产生 32 种条件组合, 满足条件的组合路径共 4 条。在 QCA 组合表达方式中, 符号*表示变量链接, 表达“且”的交集关系, 符号~表示“非”, 意味着该变量在组合中“一定不存在”, 路径组合结果见表 5。

通过表 4 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前因条件构型的一致性指标分别为 0.875、1.000、1.000 和 1.000, 均大于理论阈值 0.8。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的被解释变量的一致性数值在每种条件组合中都达到要求的阈值, 说明这些条件组合是影响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的充分条件。原始覆盖率在 0.0909091~0.636364 之间浮动, 说明条件组合能够解释的个案占个案总量介于 9.09%~63.63%。净覆盖率介于 0.0909091~0.454545 之间, 解释本组合最高达到 45.45%。4 组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的充分条件组合, 总体覆盖率为 0.909091, 表示所有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中, 约有 90.91%都包含在以上 4 种条件组合路径中; 总体一致性约为 0.909091。因此, 该 4 个条件组合能够有效解释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组合, 路径组合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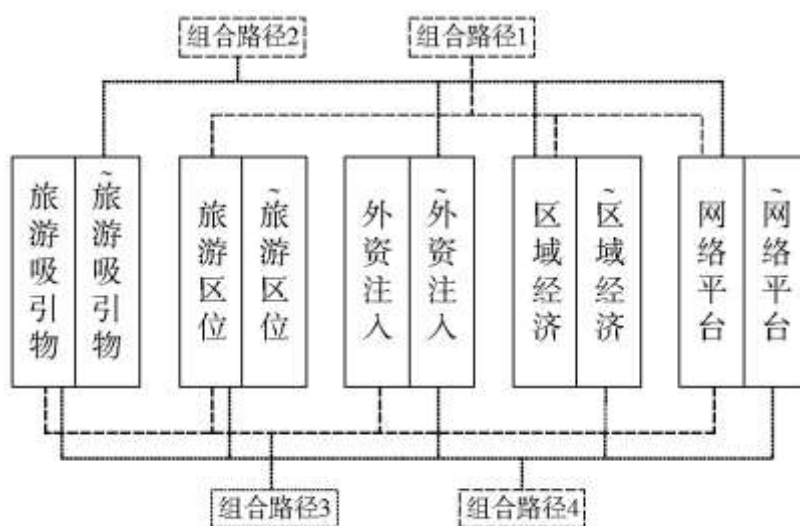


图 1 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路径模型

其中, 路径组合一的复杂解为“区域*经济*网络”, 该组合原生覆盖率为 63%, 即能够解释 63%的案例; 净覆盖率为 45%, 说明有 45%的案例仅能被该路径解释, 而不能被其他路径解释。路径组合二的复杂解为“~旅游吸引物*~外资注入*区域*网络”, 该路径组合原生覆盖率为 18%, 即能够解释 18%的案例。路径组合三的复杂解为“旅游吸引物*外资注入

*旅游区位*网络平台”，该组合原生覆盖率为 18%，即能够解释 18%的案例。路径组合四的复杂解为“旅游吸引物*~外资注入*~区域*~旅游区位*~网络平台”，该组合原生覆盖率为 9%，即能够解释 9%的案例。路径二、路径三和路径四的净覆盖率均为 9%，说明有 9%的案例仅能被该三个路径解释。

对路径组合进行具体分析可以看出，网络平台和旅游区位是在不同要素组合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单要素，均出现在三条路径组合之中。这与单变量要素分析中的网络平台和旅游区位的重要性显示出一致性。在二者共同出现并与区域*~经济组合而成的路径一中，产生了最高原始覆盖和净覆盖率。其中，有网络平台作为要素参与的路径一、路径二和路径三也显示出比“一定不包含”网络平台参与的路径四更高的原始覆盖率，缺乏网络平台和区域*~经济的路径四显示出最低的原始覆盖率。通过路径二和路径三的对比可以进一步发现，当网络平台和区域*~经济两个要素组合时，原始覆盖率和净覆盖率均达到了路径三同样的标准，而路径三则需要网络平台、旅游区位、外资注入和旅游吸引物的共同作用。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从单项因素的理论出发，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寻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条件组合。分析发现：

(1)在旅游吸引物、外资注入、区域*~经济、旅游区位、网络平台等 5 个影响因素中，虽然单变量因素分析中的旅游区位和网络平台显示出较高的一致性，但所有单变量因素均不能构成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的充分必要条件。同时，研究发现政府政策和旅游地管理作为无差别要素对所有案例地均具有影响，因此未参加路径组合的分析，但二者在推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作用具有基础性。

(2)本文指出任何单一要素无法孤立地发挥作用，需要充分发挥多元要素潜力。这一发现为旅游地带来两个方面的启示：第一，不能对单一要素产生依赖，在明确自身核心要素优势的基础上，如果能充分发挥其他要素的综合作用，将会产生更高效的结果；第二，缺乏若干要素的旅游地可通过对其余要素的组合克服劣势，实现同样良好的发展效果。

(3)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必须以条件组合的形式出现，共存在 4 种条件组合影响乡村旅游发展，4 条路径的总体覆盖率和总体一致性均达到 0.9 以上，能够很好地解释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组合，也印证了本文在影响要素选择上的合理性。在要素组合基础上研究指出，乡村旅游地发展不存在唯一的要素组合，而是存在不同的路径组合来实现发展，因此旅游地需根据自身特征选择最为适宜的要素组合方案。例如，对具有良好区位要素或区域*~经济的乡村旅游地来说，需特别重视网络平台建设，以实现最高效的发展推动路径；对于拥有良好吸引物的乡村旅游地来说，可吸引外资注入和加强网络平台建设。

(4)在路径组合中，网络平台和旅游区位是多个要素组合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单要素，其二者共同出现并且与区域*~经济组合时，产生的路径显示出最高的原始覆盖率。更具体地看，有网络平台作为要素参与的三条路径显示出比无网络平台参与的路径更高的原始覆盖率。以往研究指出了互联网平台对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意义^[40, 41]，本文印证了网络平台在当下乡村旅游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并进一步指出网络平台要素需要与旅游区位和区域*~经济、旅游吸引物和外资注入等不同要素组合而产生路径作用。基于此，乡村旅游地的发展需要在重视网络平台建设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特征选择相应的其他要素进行组合，例如加强旅游吸引物的质量和吸引外资的注入，或改善区位要素，加强从市区到乡村景区的交通建设等。

当下研究指出了政府主导、资本驱动的乡村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42]，多要素的乡村旅游地发展路径分析从要素组合层面证明了多元动力机制的作用和意义。对新的要素，例如网络平台的引入，也是未来乡村旅游地必须面对的机遇和挑战，这一点在 2020 年新冠疫情引起的旅游业的发展思路变迁中尤为凸显。面对乡村旅游地发展的复杂动力，本文旨在发掘一个新的路径视角，为时代挑战中因地制宜地最大化促进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
- [1]黄震方,陆林,苏勤,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发展——理论反思与困境突破[J].地理研究,2015,34(8):1409-1421.
- [2]陈志军,徐飞雄.乡村旅游地发展驱动因素及机制研究——基于长沙市的实证分析[J].经济地理,2019,39(10):231-239.
- [3]杨美霞.乡村旅游发展驱动力研究——以全域旅游为视角[J].社会科学家,2018(5):93-97.
- [4]卢松,张小军.徽州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的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J].经济地理,2019,39(12):204-211.
- [5]韦俊峰,何瀚林,明庆忠.中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政策的演进特征(2001-2018)——基于政策文本量化分析[J].社会科学家,2019(3):84-90.
- [6]侯天琛.微媒体时代背景下我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创新研究[J].中州学刊,2019(12):42-47.
- [7]司晓悦,马一铭.区域科技创新的财政支持政策工具研究——基于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0,21(3):85-95.
- [8]安传艳,李同昇,翟洲燕,等.1992—2016年中国乡村旅游研究特征与趋势——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J].地理科学进展,2018,37(9):1186-1200.
- [9]何景明.国外乡村旅游研究述评[J].旅游学刊,2003(1):76-80
- [10]林巧,戴维奇.乡村旅游与乡村发展的互动关系[J].经济地理,2006,26(S2):31-34.
- [11]马勇,赵蕾,宋鸿,等.中国乡村旅游发展路径及模式——以成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为例[J].经济地理,2007,27(2):336-339.
- [12]杨美霞.新旅游时代乡村旅游目的地构建中应关注的若干问题——以泰州为例[J].社会科学家,2020(4):75-79.
- [13]张丹,曾维静,杨惠玲.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研究文献综述[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5,26(10):80-82.
- [14]王莹,许晓晓.社区视角下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因子——基于杭州的调研[J].经济地理,2015,35(3):203-208.
- [15]卢小丽,赵越,王立伟.基于DEMATEL方法的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研究[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7,33(2):209-213,243.
- [16]安传艳,翟洲燕,李同昇.近10年来国外乡村旅游研究特征及对中国的启示:基于ElsevierScienceDirect收录文献的分析[J].资源科学,2020,42(5):956-968.
- [17]钱惠新.江苏乡村旅游产业空间相关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0,41(4):209-215.
- [18]Thach S V, Axinn C N. Patron assessments of amusement park attributes[J]. Annals of Travel Research, 1994, 32(3):51-60.

-
- [19]张敦富. 区域经济学原理[M].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1999.
- [20]马斌斌, 陈兴鹏, 马凯凯, 等. 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类型结构及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0, 40(7):190-199.
- [21]王松茂, 何昭丽, 郭英之. “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乡村旅游模范村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19, 39(4):199-206.
- [22]Carlsen J. A systems approach to island tourism destination management[J]. Systems Research and Behavioral Science, 1999, 16(4):321-327.
- [23]张毓峰, 乐雅. 旅游目的地治理理论构建: 一个整合分析框架[J]. 财经科学, 2019(8):123-132.
- [24]王婉飞, 吴建兴, 吴茂英. 乡村旅游发展中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驱动因素研究[J]. 旅游学刊, 2018, 33(8):37-47.
- [25]Mair H. Global restructuring and local responses: Investigating rural tourism policy in two Canadian communities[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06, 9(1):1-45.
- [26]何景明. 城市郊区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研究——以成都农家乐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6(6):71-75.
- [27]Lun L, Pechlaner H, Volgger M, et al.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mountain regions: Identifying success factors, challenges and potentials[J]. Journal of Quality Assurance in Hospitality & Tourism, 2016, 17(4):389-411.
- [28]马静, 舒伯阳. 中国乡村旅游 30 年: 政策取向、反思及优化[J]. 现代经济探讨, 2020(4):116-122.
- [29]舒伯阳, 马静. 中国乡村旅游政策体系的演进历程及趋势研究——基于 30 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19(11):94-107.
- [30]冀瑞鹏. 古村落旅游利益主体诉求及表达途径研究[D].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 2013.
- [31]赵兴军. 旅游产业结构优化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J]. 社会科学家, 2018(11):68-74.
- [32]周欣琪, 郝小斐. 故宫的雪: 官方微博传播路径与旅游吸引物建构研究[J]. 旅游学刊, 2018, 33(10):51-62.
- [33]Ragin C C. 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M]. California: Univ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
- [34]Ragin C C. Fuzzy-set social science[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 [35]伯努瓦·里豪克斯, 查尔斯·C. 拉金. QCA 设计原理与应用[M]. 杜运周, 等,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
- [36]Fiss P C. Building better causal theories: 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54(2):393-420.

-
- [37] 万筠, 王佃利. 中国邻避冲突结果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 40 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 公共管理学报, 2019, 16(1): 66-76, 172.
- [38] 包国宪, 马翔. 兰州市洒水治污政策变迁路径与动力研究——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法[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20(4): 29-39.
- [39] 赵文, 李文霞, 孙国强. 二元社会网络与海归企业创新绩效——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J]. 华东经济管理, 2017, 31(6): 113-118.
- [40] 陆林, 任以胜, 朱道才, 等. 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研究框架与展望[J]. 地理研究, 2019, 38(1): 102-118.
- [41] 林德荣, 陈莹盈. 智慧旅游乡村建设的困境与突破: 从智慧潮流走向可持续发展[J]. 旅游学刊, 2019, 34(8): 3-5.
- [42] 周思悦, 申明锐, 罗震东. 路径依赖与多重锁定下的乡村建设解析[J]. 经济地理, 2019, 39(6): 183-190.